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02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

——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80周年

刘林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80年前,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化,目的在于改变中国,在“化”中国的同时,中国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教条主义;中国革命道路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014-08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他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有近90年的历史,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也已80年了。8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进—曲折—再前进”的历史演进中,以中国的巨大变化的实践成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硕理论成果,为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丰碑。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0周年,就是要永远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道路走下去。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

在中国革命早期,瞿秋白曾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这一思想十分重要。但他没有系统论述,也没有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光辉思想一闪而过。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已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求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求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提出新路线^①。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战争实践中提出的,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指导路线,明确反对不做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实际,只凭“本本”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路线。这篇文献,实际上已经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精髓。因此,作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标志性成果,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提出调查研究、纠正“本本主义”的错误,不仅系统论述,而且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反对本本主义》是第一篇,毛泽东是第一人。

正式在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

^① 收稿日期:2018-07-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710002)

作者简介:刘林元(1941-),男,江苏靖江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这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没有明确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理解,这里的“具体化”就是“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据了解,毛泽东开始写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后来把“具体化”改成“中国化”。一定是出于某种考虑,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仍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党和毛泽东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中国,改变中国,使中国发生变化,这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来说的。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即中国特点)相结合,“化”成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即哲学上所说的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三是把中国实践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中国实践的要求,同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化”来又“化”去,这是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表述中,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没有明确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如果把具体结论中国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还是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只是搬了家,从马恩书本中照搬到中国来。

我理解,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具体结论。理由有二:一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对各国革命具有普遍性意义,具体结论并不都具有这样的普遍意义。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合各个国家,从而也适合中国的,因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具体结论,是根据具体的人和事,适合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明确的观点和结论。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特点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的运用,否则就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抽象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毛泽东这番话告诉我们,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而不是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无产阶级宇宙观帮助了全党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因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都具有抽象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是这样,所以要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深刻理解,正确把握和应用。

第三个问题,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根据中国特点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讲中国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所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

对这个问题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化,主要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中国,改变中国。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③。而当时,教条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影响,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斗争还在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还处于主要地位。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反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而教条主义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③孟轲,聂立清:《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大体系”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主要特征是离开中国国情、中国特点,照抄照搬马恩“本本”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主题,强调要根据中国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十分正确的,及时的。在当时,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提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中国革命经验还不够完整,总结经验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条件还不够成熟,在这种条件下,不提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恰当的。当然,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产生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成果和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硕成果,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实践的指导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实践、结合、实践。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前提,中国实践(或中国国情)是出发点,结合是关键,实践是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发展表现如下: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即所谓实践理念。然后,再在实践理念的指导下,进入实践过程。实践终了之后,使中国实现了变化,中国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也产生了解决问题的经验,用科学方法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只要上述每一个环节都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终端所产生的理论就是科学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必然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那么,为什么说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它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也不是马恩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理。这些真理不是为解决中国

问题而准备的,但只要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从中国实际出发,就能指导中国实践。期望通过对号入座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①

当然,并不是说马恩列经典作家著作中不存在具体结论和具体答案。但这只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针对特定的人和事,特定的实践需要作出具体结论和具体答案,但它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教条。同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答案也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预先准备的,如果我们盲目照搬,牵强附会,只会弄巧成拙。那么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到哪里去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分析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去找。因此,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期望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一句空话,中国问题的解决或者被教条主义引向失败,或者被其他什么“主义”引向邪路。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得住?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十分重视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口号叫的是十分响亮的,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划定至今未有明确的权威说法。马恩列著作光全集就有几百卷,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观点千千万,万万千。如何把握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就显得非常重要,非常迫切。如果把基本原理的范围扩大化,把非基本原理当作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来坚持,就可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把基本原理的范围划小了,把应当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个别观点来对待就可能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的错误。这两种片面性的错误都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有自己的想法,但一直未能有一种明确的、公认的说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想法,现提出供学者批评指教,以期把研究引向深入。我想,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示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的。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不提供现成的教条,只是提供方法。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方向。恩格斯提示我们,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毛泽东从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对于重新考虑世界和中国的命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他在延安时期提出,要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炼立场、观点、方法,显然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立场。所谓“观点”就是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包括历史观、价值观)。这里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歧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是指宇宙观和世界观一个层级的根本观点,不是指那些具体观点(如认为未来社会主义是“三无”世界,即无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搞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所谓“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的方法论。

邓小平有几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次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次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提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点要求,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实践的要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内容和观点。

基于对以上表述的理解,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原理;
- 2)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
- 3)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 4) 唯物辩证的方法论;

5)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认识;

- 6) 革命改革创新精神;
- 7) 实事求是原则;
- 8) 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和建设思想;
- 9) 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

上述这些原理和思想可以归并成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二是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和前进方向的科学理论;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的科学性,即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所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这已经为实践经验和理论逻辑的双重认证。二是它的抽象性,正因为它有抽象、概括的特性,所以才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性。三是它的普遍意义只限于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指导,而不是也不能代替具体认识和具体改造。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这三种特性,所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又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性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来自革命队伍中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派别,它的特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教条主义者或者坚持马恩“本本”,照抄书本结论,或者照搬别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实践,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为“模版”,或其他国家经验的“再版”。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阻力和破坏性因素。鉴于教条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严重损害,毛泽东对之切齿痛恨,在谈到教条主义时,每每用语辛辣,大加挞伐,愤怒之情溢于言表。1943 年,在延安整风时,他说过一番话:“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弄的乌烟瘴气,白区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②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3 页。

^②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1 页。

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太多”,是指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只会背诵,引用马克思主义语录、词句,搬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条条,张口马克思,闭口马克思。毛泽东把这种“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人,斥之为“贩卖马克思”的先生。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太多”的教条主义者,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认识,而且用“贩卖马克思”达到自己自私的政治目的,所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痛恨有加。

以“贩卖马克思”为营生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阻碍表现在:一是教条主义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愿意别人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只会搬弄马克思主义语句,用以吓人,把反对自己的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革命同志打下去,给革命敌人创造“闹光”共产党的机会。二是教条主义在脱离中国实际,认为只要照搬“本本”和莫斯科的经验,不需要了解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就会胜利。这种盲人骑瞎马式的指导中国革命,必然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失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中国实践化,这是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而教条主义既不懂得也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缺乏马克思主义之“矢”,又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具备中国实际之“的”,那就只能“无的放矢”。教条主义既上不靠“天”,依靠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支撑,又下不着“地”,不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他们是悬在空中的梁上君子,对中国革命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三是教条主义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苏俄的具体经验,认为这是亘古不变的教条,而不愿也不能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时空条件下实现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与时俱进,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会产生改变中国的实践结果和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后者是新时代新实践基础上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在教条主义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一旦创立就万世不变,谁要创新发展,那就是离经叛道,教条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反对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三股源流。第一股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生硬理解并搬

用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奉为教条。第二股源流是李立三等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照搬列宁、托洛茨基指导十月革命的理论,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第三股是王明、博古为代表,无视中国国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苏俄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对这三股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成功实践就是斗争的胜利成果。

教条主义的第一股源流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生产力很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欧洲要缓。中国革命要分两次完成,第一次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次革命因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可以参加,但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待到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了,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二次革命论”不是陈独秀的创新,而是抄自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行讽刺和批评。陈独秀扭曲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讲的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但中国的国情特殊,资产阶级弱小,并有两面性,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其中的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因此,在民主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陈独秀不懂得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不能搬到中国来,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首先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没有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是教条主义所致。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实践形式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这是教条主义的第二股源流。“一次革命论”的提倡和坚持者认为,中国

革命应该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开始就高举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把两大历史任务放在一次革命中完成,叫做“毕其功于一役”。这一理论是列宁、托洛茨基提出的,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实践。中国的“一次革命论”就是照抄俄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一步到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教条主义导致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既反对“二次革命论”又反对“一次革命论”,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归宿。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懂得中国国情,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错误、有害的。同时,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先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再走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做法,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左倾冒险主义。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第一步先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践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作。

民主革命中,教条主义的第三股源流是王明为代表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这股源流的代表人物都是本文上述的被毛泽东斥之为“贩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人。他们的教条主义主要是“贩运”俄国革命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不宜对苏联革命经验说三道四,这是可以理解的。王明等人顽固坚持中国革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坚持城市中心论,而毛泽东则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倡并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而激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六年之久,影响十

年以上,造成对中国革命的惨重损失。由于毛泽东的坚持斗争,教条主义错误教训给全党的教育,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与王明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过去研究很多,很成熟,本文不再累述。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坚持 and 发展的。不反教条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持 and 发展,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

四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创新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碑

毛泽东倡导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年代最大的实践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分析中国国情,在实践中找到的。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中发现的,也不是从国外搬来的,只要回顾和总结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就十分清楚。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内容,这是个空白。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说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没有马恩具体理论指导,世界上又没有发生过这种革命的成功经验,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全盲目实践成功的?不是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功的。就是说,这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而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情形就是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中国的国情,确认这是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性质,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并确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主力军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并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革命的道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点,形成了中国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综合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的原理,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原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人民主体思想。在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理念时,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革命事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天”,中国实际是“地”,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是把“天”与“地”连接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实践理念,即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付诸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功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物质成果,改变了中国,中国革命胜利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是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使之理论化、系统化,这就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实现二者的结合→形成实践理念→进入实践过程→实践产生几大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新实践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演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是个空白,世界上又没有现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既没有成功的经验,也没有失败的教训,理论和实践都是空白。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填补了这个空白。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无中生有”的创造。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

革命道路则是另辟蹊径的创新。

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征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走出了一条通过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途径,和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是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这是等同的;不同的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并没有涉及到,世界上也没有实践的经验,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则有明确的观点,苏俄又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要创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难度则更大,要创新就不能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也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只能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选择,这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后,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跨出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明确的,首先是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再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暴力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但他们虽然推动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并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马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成功。首先组织了十月革命的暴动,武装夺取了政权,然后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对象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迫使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交出工厂、土地等生产资料。违抗者加以镇压,甚至肉体上消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但没有照抄马恩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也没有照搬苏俄暴力革命的经验,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无产阶级领导

的革命统一战线,是革命的动力之一,社会主义时期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政治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对象,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是人民的一员,具有选举权。在经济上,对他们采取赎买政策,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改造企业与改造人结合起来,把企业从资本家私有的剥削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农村,则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把广大农民逐步引导到农业合作化道路上来。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有缺陷,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国情没有用暴力,而是和平改造的途径,走出了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

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又一伟大成就,大大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五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巨大工程,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毛泽东开创并在革命年代不断推向前进的。在他去世后,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征途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并影响着世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Mao Zedong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U Lin-yu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Provincial Research Base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Eighty years ago,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created the great caus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practic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change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m. To realiz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key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firmly opposing the interference and destruction of dogmatism. Mao Zedong insisted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found the road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ti-dogmatism; Chinese revolutionary road

(责任校对 廖和平,蒋云霞)